

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

从“让群众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 到打造“共富型体制机制”

——习近平在浙江关于共同富裕的探索与实践·改革动力篇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改革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键。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明确指出“让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惠”。深入挖掘、系统研究习近平同志关于通过改革来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将为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提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引。

一、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及实践探索

共同富裕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既包括物质富裕,又涵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是激发经济活力和人的创造力的引擎。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始终将改革作为实施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的原动力,使改革的理念、方法贯穿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领域全过程,在省域范围率先探索形成了“走向共同富裕”的制度机制。

(一)坚持“扭住发展不放松”,通过发挥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优势,形成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做大共同富裕“蛋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将“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习近平同志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财富的增长始终是发展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他结合浙江实际创造性提出“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要求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继续保持全国的领先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大的生机和活力。他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深化改革”,“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这些重要论述表明,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以改革为动力推动浙江阔步前行,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着力形成让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他多次指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大胆探索国有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支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牢牢抓住改革的关键环节,突破体制上的瓶颈,着力在推进产权主体多元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构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习近平同志还亲自指导和推动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新型国有资产监管体系,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到2006年,浙江国有经济总量比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42倍,国有资产总额、总资产报酬率及净资产利润率等主要指标跻身全国前列。

民营经济一直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新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浙江民营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步减弱,迫切需要通过大力推进创新营造竞争新优势。习近平同志多次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提出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如进一步放宽领域、降低门槛,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中介服务和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舆论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和法制环境等,推动构建形成浙江“实现民营经济发展新飞跃”的体制机制。他高度肯定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多次强调“民营经济的发展为浙江国有企业改革乃至整个宏观领域的改革提供了动力源泉”,“这就是说蛋糕做大了,蓄水池做大了,国有企业相应地也就壮大了”。正是因为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浙江走向共同富裕才有了更为坚实的根基。

浙江是我国经济外向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充分认识到利用外资的作用,而不能将内生机制与外生机制分割开,不重视用外力来推动发展”,“引进外资从资本的角度来看,是多赢多善的,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引进外资也意味着引进跨国公司,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引进市场销售网络,推进结构调整”。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对选商

引资工作提出要求,在高度重视“以民引外”“以外引外”“东引台资”的同时,推动引进世界500强等大型企业 and 高技术产业项目来浙江投资落户,大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二)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建立有利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2003年,浙江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180元和15431元,城乡收入比高达2.43,而且城乡收入差距、生产生活环境差距还呈现扩大趋势,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已经严重影响“三农”发展。习近平同志审时度势,作出了一系列有力有效的部署。他指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完成这项工作,全中国浙江最有条件”,“我省已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的新阶段,这也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在这一新阶段,通过深化改革,着力破除城乡体制障碍,妥善解决各类社会矛盾的任务十分紧迫”。他还就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作出了具体部署:在改革方法上,“要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考虑,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形成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在改革内容上,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部署实施了县乡财政体制、乡镇机构、征地制度、农村金融、教育卫生等农村综合改革,探索实践了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试点。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体制转变为集体经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力促进了农村生产力水平提高,但在发展中也出现了统一经营服务功能弱、集体组织涣散等问题。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是在坚持和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完善农村生产关系的一项重要举措。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经济在坚持和稳定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内涵,创造了新的形式,加强了农民专业合作体的薄弱环节,为家庭生产经营进一步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开辟了新的空间。此外,浙江还出台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意见》,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保障,使浙江农村生产关系和农业经营体制取得突破性突破和长足发展。

城乡差距还体现在城乡环境的巨大差异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浙江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民的人均收入一直位居全国前列,但也出现了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滞后,城乡之间差距拉大等问题,尤其是农村规划杂乱无章、生产生活环境恶化、农民生活“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等现象有愈演愈烈的态势。2003年,习近平同志履新浙江不久便提出要“用城市社区建设的理念指导农村社区建设,抓好一批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镇”,“使农村与城市的生活质量差距逐步缩小,使所有人都能共享现代文明”。当年6月,浙江召开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现场会,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相关工作。他还特别强调要用制度化的方式保障推进,提出建立健全“体现群众愿望、时代特征、与时俱进要求的建设扩容机制”“体现资源节约和城乡一体导向的科学规划机制”“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投资建设机制”“改革先导、城乡互动、政策配套的制度创新机制”“领导挂帅、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工作推进机制”等五项机制,有效遏制了城乡环境差距日益扩大的态势。

(三)坚持“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

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浙江进入了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习近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不能留盲区死角,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乡镇也不能掉队”。在具体工作中,习近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念好‘山海经’”“做

长欠发达地区这块‘短板’”等一系列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改革创新理念,还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比如,他指出“舟山可能就是我省一个很大的后发优势”,“舟山要把海洋经济这篇文章做深做大”。在路径上,他要求“如科技特派员制度,实践证明很好,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进一步加大结对帮扶和‘山海协作’力度,创新扶贫机制,拓宽区域协作和结对帮扶领域”。他还着力推动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调整了省对市县的“两保两挂”政策,实行发达地区干部、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到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任职工作或轮换下派制度。习近平同志领导实施的“百亿元帮扶工程”“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山海协作工程”三大工程,不仅在当时快速提升了浙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着眼长远形成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推动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摘帽。

(四)坚持“文化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强调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中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需要发挥“文化的力量”,着力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2003年6月,浙江被确定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中央要求浙江先行先试。当年7月,习近平同志召开专题座谈会,强调“文化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他要求“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不断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吸引力和感召力”。2005年,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部署实施文化建设“八项工程”(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其中重点围绕公益性文化事业改革和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改革和发展、文化管理体制创新三方面,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共同富裕中实现精神富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

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抓手。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改革,要以增加投入、转换机制、改善服务为重点,使其不断增强活力。他要求,“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习近平同志的推动下,浙江公益性文化事业稳步推进,公共文化设施、文化旅游场所实行免费开放,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常年免费开放的省份,并由此带动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文化场馆免费热潮。浙江还率先实行“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加大公共文化资源面向基层、面向群众配送力度,满足群众文化需求。

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习近平同志针对当时浙江文化产业现状,谋划并部署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他强调,“经营性文化产业的改革,要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加快培育文化市场主体和文化市场体系”。浙江从实际出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放开放活,突破文化产业发展的体制瓶颈,着力推动重点产业、重点企业、重点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横店影视等一批有全国竞争力的文化产业蓬勃发展,浙江新华发行集团等有活力的文化流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义乌文化用品博览会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化会展品牌加快形成,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浙江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重点,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着眼于管住方向、管活机制,管出效益,管好质量。要把管理重心放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上,管导向、管原则,管规划、管布局、管市场、管秩序”,“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

政等手段,发挥经济政策杠杆作用,改善宏观调控体系,加快建立党委领导、调控适度、运行有序、促进发展的宏观管理体制”。这为浙江以文化管理体制促进文化繁荣、精神富有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五)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注重从体制上化解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擦亮共同富裕生态底色。生态环境关系共同富裕的底色和成色。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作为先行发展的省份,生态环境污染的阵痛愈加明显,成为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同志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目的,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这自然包含着人们生产生活环境质量的提高”。在他的推动下,浙江出台《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制定全国第一份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鲜明提出建设以循环经济为核心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保障体系,山川秀美的生态环境体系,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的人口生态体系,科学、高效的能力支持保障体系等五大体系,拉开了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生态省建设大幕。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破解长期困扰地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理念指引。他强调,“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在选择之中,找准方向,创造条件,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他还要求,“把握新时期环境保护的特点,注重从体制上化解环境矛盾,注重运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治理污染,注重把环境保护纳入宏观调控的目标和任务,注重依靠科技创新促进环境保护”。

在推进生态环境领域各项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始终要求必须发挥好体制机制创新的驱动力。他强调,生态省建设要以“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坚定不移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习近平同志的支持推动下,2005年,浙江对六大高耗能行业实行差别电价改革和煤电价格联动改革,并在全国率先出台省级层面的生态补偿办法;2006年,启动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全省反映资源稀缺程度、污染排放数量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逐步形成,水权交易、排污权交易等要素资源配置制度改革积极推进,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省建设重大决策监督机制、循环补贴制度等绿色财税制度初步建立,推动浙江率先驶入打造共同富裕生态之美的快车道。

(六)坚持“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着眼形成一整套良好的和谐社会运行机制,推动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

共同富裕的主体是全体人民,始终围绕人民群众、突出人民群众共享真实有感的发展成果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根本立场和价值旨归。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高速发展,浙江社会经济结构快速变动,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先发展早发且日趋复杂。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在深入系统调研的基础上,他指出“在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背后,隐藏着较大的城乡差距,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质量与城市居民的差距还在扩大”,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问题。

制度是管大局、管根本、管长远的,有权威性、强制性和公信力。习近平同志非常善于以制度化手段来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他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更好地发挥财政转移支付的‘二次分配’和慈善事业充当‘三次分配’的作用”。他还要求“完善城乡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农村‘五保’和城镇‘三无’对象集中供养制度”,“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新型社会救助体系”,“以深化科教文卫体制改革为着力点,推进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

享改革成果,习近平同志在2004年推动建立了为民办事实效长效机制,并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闭环运行机制,包括建立健全民情反映机制、民主决策机制、责任落实机制、投入保障机制、督查考核机制等,使这项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时至今日,“为民办事实”依旧是浙江各级政府工作报告的重要内容,实实在在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认同感。

安全是发展的基石,也是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保障。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习近平同志带领省委班子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部署。他还要求,“必须着眼于制度来谋划,建立健全正确引导发展的激励机制、顺达通畅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全面覆盖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整合机制、有效疏导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制”。正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平安浙江”建设日益深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毛细血管”,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真实可及的安全感。

二、浙江深入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具体实践及成效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以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之后历届省委、省政府不断完善促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提供了重要遵循。自“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部署实施了一系列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如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河长制、特色小镇、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改革、“四张清单一张网”、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等,不断构建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科技创新体系、全面开放体系、协调发展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等十大体系,使群众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中唱响改革“大合唱”。

(一)围绕建设“经济大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愈加厚实。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要进一步把“蛋糕”做大,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浙江始终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务”的要求,坚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大力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持续推进创新驱动,多年来经济发展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深化资源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着力推进减税降费改革,持续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经济发展质量显著增强。2007年至2023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8640亿元增加到82553亿元,人均生产总值从3.71万元增加到12.50万元。二是加快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迭代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改革,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一号改革工程”,市场主体活力迸发。自2020年起,连续四年在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位居全国第一;浙企数量连续25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居全国第一。三是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聚焦以混改为主导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出台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1+6”行动方案、《浙江省国资国企数字化改革行动方案(2021—2025年)》等多项改革配套政策,新型国有企业发展体制逐步建立。四是建立健全对内对外开放机制,坚持“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成功承办G20杭州峰会,创新谋划打造“一带一路”枢纽,建立健全自贸开放大通道、开发区、自贸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机制,“走出去”“引进来”双向发力。2023年,全省出口占全国份额升至第二,进口首次跻身全国前五,外贸贡献率居全国首位。五是推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聚焦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深化完善四大都市区建设体制机制,推进扩权强县和强镇扩权等改革,不断深化“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和新型城市化改革,全面缩小

城乡差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7年的57.2%提高到2023年的74.2%,居国内第一方阵;2023年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1.86,连续11年呈缩小态势。

(二)围绕建设“法治浙江”,强化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作用。

法治是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浙江坚持贯彻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重大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生态保护、新经济新业态、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一体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共同富裕铺就法治基石。比如,2007—2022年,浙江共制定(修订)地方性法规171件,其中《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等20多部地方立法开创了全国第一。与此同时,浙江还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改革,特别是通过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基本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创新推进“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依法行政能力大幅提升。目前,浙江成为“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群众和企业获得感最强”省份之一。同时,还以司法理念的及时更新和全面深化改革为内生动力,推出“八项司法”(2009年年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全省人民作出了“抓好八项司法,服务科学发展”的承诺。八项司法即能动司法、和谐司法、民本司法、协同司法、规范司法、阳光司法、廉洁司法、基层司法)和“三大机制”(2016年9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大立案、大服务、大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全社会法治风尚更加浓厚,“法治浙江”建设群众满意度逐年提升,走在前列,浙江被公认为是最具安全感、司法文明指数最高的省份之一。

(三)围绕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全省人民精神共同富裕。

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就是围绕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文化供给。浙江坚决贯彻习近平同志谋定的“文化大省”建设方略,守正创新、破立并举,持续深化文化领域各项改革,不断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2008年,制定出台《浙江省推动文化大省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提出把改革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点和动力。2013年,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若干意见》,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动力引擎作用更加强劲。全面完成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任务,荣获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先进地区”称号。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专门设立文化体制改革专项小组,设立省国有文化资产管理委员会,大力实施“健全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86个文化体制改革重点项目,出台《关于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意见》《进一步健全国有文化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文件。两次召开文化产业大会,将文化产业列入重点发展的“八大万亿产业”,编制《浙江文化产业带发展规划》《浙江省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规划》。文化事业在改革的催化下蓬勃发展,城乡一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构建。浙江音乐学院、浙江自然博物院、小百花艺术中心、杭州国家版本馆、之江文化中心等重要新时代文化地标全面建成并高品质运行。全省建成2万多家农村文化礼堂,500人以上行政村实现全覆盖。每万人拥有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从2016年的2350平方米增长到2023年的4259平方米。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5万余家。

(四)围绕建设“平安浙江”,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构建舒心的社会环境。

(下转第十版)